

望城文史



第五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望城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989

目 录

•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 •

程潜起义与中共联系的秘密电台.....	史 锋 (1)
我为迎解秘密电台送密电.....	周咏常 (4)
报晓的知更鸟.....	梁宜苏 (7)
掩护地下电台.....	任培宇 (10)
水利建设四十年.....	姚国庄 (15)
回顾西塘农业合作社.....	易正昌 (20)
县城的三次规划和十年建设.....	周 健 (29)
团山湖的变迁.....	李仲海 (35)

• 抗 日 烽 火 •

✓白寇沦陷望城境域时期调查.....	张 超执笔 (40)
附：日寇侵略望城据点图.....	余光灿制图 (59)
活动在湘北的一支自卫军.....	金见晃 (60)
✓铁蹄下的苦难岁月.....	刘瑞祥整理 (66)
✓鹅羊山下血泪史.....	李良红整理 (77)
✓国耻家仇话当年.....	周策屏口述 (79)
✓白寇给我家造成的灾难.....	彭克诚 (82)
✓铁蹄蹂躏记忆犹新.....	王再和 (84)
✓难忘那一天.....	杨明哲 (87)

• 人 物 春 秋 •

- 血染枫林人未消 饶国平 (89)
易顺鼎烈士传略 张仲孝 (95)
张敬明烈士简介 张叔枚整理 (98)

• 往 事 钩 沉 •

- 主席曾赠《蝶恋花》 黄时葵 (99)
长沙“文夕大火”见闻点滴 张守祺 (103)
修整杨开慧烈士墓地轶事 丁继三口述 (106)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谭怀杰 (109)

• 名 胜 风 光 •

- 书堂山忆旧 陈克新 (113)
附：书堂山寺、校原貌写意图 陈克新 (118)
黑麋峰览胜 罗养一 (119)

• 海 峡 情 思 •

- 元霞阁记 陈敦正 (124)
身老台南，乡心不泯 刘继向 (127)
长岳途中感赋 刘汉屏 (130)
步《长岳途中感赋》原韵七律一首 金秉萱 (130)

程潜起义与中共联系的秘密电台

史 锋

1949年7月初，毛泽东主席收到潜程呈交的起义《备忘录》，阅后，十分重视，立即于7月4日亲拟电稿，复程潜。电报全文是：“颂云先生勋鉴：备忘录诵悉。先生决心采取反蒋反桂及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之方针，极为佩慰。所提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存贵部予以整编教育等事项意见均属可行。此间已派李明灏兄至汉口林彪处，请先生派员至汉与林将军面洽商定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军事处置诸项问题。为着迅赴事功，打击桂系，贵处派员以速为宜。如遇桂系压迫，先生可权宜处置一切。只要先生决心站在人民方面，反美反蒋反桂，先生权宜处置，敝方均能谅解。诸事待理，借重之处尚多。此间已嘱林彪将军与贵处妥为联络矣。毛泽东 午支（即7月4日）。”第一次直接向程潜表明了中共中央的态度，对程潜、陈明仁起义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电报由我方秘密设在长沙县九福乡洪家冲（今望城县桥驿乡洪家村）的电台接收后，火急送交程潜。

提到秘密电台的设置，有一段艰难曲折的过程。

首先要从黄雍为反对内战而辞去高级将领之职谈起。黄曾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中将高参，1949年初在南京《中央日报》上声明请求退役的高级将领之一。人家问他为何辞职，他答：“不辞职，还去打内战吗？”从此，黄与肖作霖一起筹办《大道报》，后又在上海办私立中正学校。

1949年春夏，他支持该校学生参加上海工人和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游行，引起了该校反动势力的“驱黄运动”，

是年暑假他毅然去职。

其二，早在抗日战争时期，黄在重庆任军事委员会中将高参时，即与中共党员吴克坚有联系。当时，吴负责《新华日报》工作。1948年8、9月间，中共中央派吴克坚到华东地区工作，通过地下工作者戴宗义的联络，与黄雍会了面。因黄、戴都是湖南平江人。吴克坚问黄雍，在当前形势下可能做些什么？黄说，愿回家乡湖南，为解放事业做些工作。吴表示，具体任务需要请示，嘱黄安心等候。深秋，黄回到了长沙。1949年春节前三天，黄收到从上海发来的电报，通知他赴沪，黄雍如约前往，在那里与吴克坚晤面，吴代表组织交给他的任务是了解湖南军政界的动态，稳定程潜，促使陈明仁、李默庵等黄埔出身的将领随程潜和平起义。吴征询黄的意见，有什么要求没有？黄提出两点：一是请党中央派干部到长沙具体指导工作，二是请拨给通讯工具（电台）并配备工作人员，吴同意了他的要求。

其三，1949年4月底或5月初的一天黄昏，与地下党负责人周竹安联络的周茂僧，找到正在湘雅医院住院的黄雍夫人郑挹梅，向她讲述设置秘密电台遇到的重重困难，并要她出来负责掩护电台和报务员的任务。第二天，郑办理了出院手续，即随同周茂僧来到一座小院，介绍他认识一位青年。从此，他们便愉快地合作了。为了工作方便，他们之间就以姐弟相称。郑挹梅还给这青年起了个名字叫郑明。郑家住长沙北门外潘家坪11号，是一座两层楼房，院子有围墙，郑住楼上，楼下两家邻居，一个姓高，是其长官的副官，一个是警备司令部的熊科长，他们都睡得很晚，半夜里还出出进进，使两郑不敢开窗把天线伸到外面去。约定呼叫的时间是深夜两点，但接连两个晚上都没有叫通，两郑十分着急。第二天，他们出外查看环境，走

到北门外文昌阁附近，见不远处的屋顶上空有个天线网，郑明知道是侦察台，他告诉郑挹梅，住处离这儿太近了，实在不安全，必须另找地方。后来，地下党组织决定将电台转移到离市区六十多华里的长沙县九福乡洪家冲，这里距桥头驿火车站约十华里，地处丘陵，比较偏僻。由于没有电源，只好改用干电池。

7月，郑挹梅为解决电瓶问题曾回城一次，走到潘家坪家里，发现住着两位客人，一叫周竹安，是中共中央派来湖南的负责干部，具体与黄雍接头，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们在重庆就见过面。另一人是秘密电台的译电员。

其四，黄雍、陈明仁在未进黄埔军校之前，就在程潜开办的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受过训，与程潜有师生之谊。二十年后，政治风云又把他们卷进了湘中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当时的湖南和平解放运动，经各方人士共同努力，时机已渐成熟，但程潜孤守省府，承受广州方面的压力和白崇禧的威胁，人们担心他难以顶住，可能离湘去港（其眷属已于五月送往香港）。黄和周竹安商定，要当时与程潜有深交的省银行行长李维城向程进言，使他和党中央直接对话，坚定起义的信念。

7月上旬的一天，程潜在省府大宴宾客，好像是要离开湖南，但又没有公开表示出来，宴毕，李维城跟随程潜进入内室，交谈中，李向程透露了黄雍与中共的关系。程即嘱李约黄雍于当晚十时由省政府后门来见他。黄冒雨应约前往，见程潜在室内来回踱步，忧心忡忡，焦虑不安，几次走到窗前望着阴沉沉的雨天，良久，叹息道：“真是亡国之天！”“我这样苦，毛润之又何尝知道！”黄雍趁此机会接着说：“颂公，您的处境毛主席都清楚哩！”程又说：“来接头的很多，真伪难辨。”黄告以“颂公如有什么想法，我可以代为转达毛泽东主席。”程潜听到这话，不免怔了一下，坐下来并叫黄雍移近他身

我为迎解秘密电台送密电

周 咏 常

长沙和平解放四十周年了。和平解放前夕，党中央曾在这里设立迎解秘密电台，通过它把湖南地下党促成程潜起义的情况与中央联系，我当时为这个秘密电台传送密电码。四十年过去，现在回想起来，当年情景记忆犹新。

1948年，我在长沙市四方塘青年会国际电影院担任放映员。11月的一天，突然接到一封从上海昆仑电影制片厂寄来的信，拆开一看，里面还有一个信封，是写给茂伯的（茂伯叫周茂僧，原为国民党32集团军将领，解放后任省参事室参事），要我转交。我随即将信送往住在伍家井15号的茂伯家里。他说：

“以后还会有信来的，都由你那里转交好了，因为电影制片厂写信给电影院是对口的，不易引起怀疑。”他还嘱咐我要慎重

边，问“你们有通讯工具吗？”黄答“我们经常联系。”程随即起身拿起电话筒与陈明仁将军通话，告诉他：“我已和黄雍见了面，决定不走了。”接着程拟了一份电报交给黄雍，直接与中共中央取得了联系。

1949年8月4日，程潜和陈明仁领衔发出了起义的通电，宣告湖南和平解放，秘密电台从此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本文作者，望城县党史办干部。）

一些，千万不可对别人说。这时，我才知道，信是聪伯写给他的。聪伯原名周友聪，后叫周竹安，他是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解放前一直从事地下工作，解放后在外交部任职，曾出任保加利亚大使。抗日战争时期，他与茂伯同在重庆。解放前夕，他要茂伯回乡，打着“中央军校毕业生调查处长长沙分处”的旗号，开展地下活动。1949年4月间，周竹安派人从汉口南方局领来电台设备，交给周茂僧等建立地下迎解秘密电台，在周竹安领导下开展工作。

秘密电台开始设在长沙市上营盘街钱去非家。报务员叫李勇，译电员叫章朴，他们都是党中央派来的。李勇在长沙的住处当时我不知道，章朴和茂伯的儿子周浩磊住在南门外贺家塘12号，他们常到我住的地方——国际电影院机房下一间简易的屋子里来。因为电影院的职工大都住在市内自己家里，只我一人家在乡下，因白天不放电影，这里十分安静。不久，电台被敌特侦测干扰，又转移到湖正街李维城家。由于局势日益紧张，在这里也曾遇到了麻烦。

为安全起见，周竹安与茂伯商量，决定将电台转移乡下。1949年5月4日，电台经过一番伪装后，雇人挑到我的家乡——长沙县九福乡（今望城县桥驿乡洪家村万家屋场），架设在周商农家后山上。周商农是我们的本家，原在国民党军队任师长，绰号“周三豹子”。他家后山一般人是不敢去的，因此，电台设在那里比较安全。而且有九福乡周传第等掌握的六乡联防办自卫大队保卫电台工作，该部是我地下党秘密控制的武装力量。

电台转移到乡下后，报务员住在周商农家，从不露面；译电员章朴则住在我家，由我父亲周茂生负责他的安全。父亲特地在屋后搭了一张梯子，以便遇到紧急情况随时可以从后山脱

险。这些日子茂伯也随同回了老家，他就住在我家的隔壁。

我负责送电码的工作，在长沙时是从电台处送给章朴，经他译电后，谁执行送出任务，我就知道了。电台转移到乡下，我就从周商农家和长沙周竹安处往返传递。送密电是用铁伞的方法进行的，有几把相同的伞，电码藏在伞蒂内，每次我从大门背后换了伞就走。在乡下，我装扮成钓鱼的人，去长沙则以买东西为名。有次，我送密码去长沙，走到先锋厅时，见前面有宪兵检查，便赶紧走进一家小理发店理发，躲过了检查。

电台所用的电瓶，要从长沙运回，途中必须特别谨慎，严防暴露。一次，茂伯写了一封信，叫我带给聪伯，信的大意是：眼下农村青黄不接，生活十分困难，现派桃儿（我的乳名）来，请买些豆渣，叫桃儿挑回。聪伯见信后，写了一张条子，叫我去小吴门一家豆腐店取了电瓶，放在箩筐里，上面用豆渣覆盖得严严实实，然后挑着乘船回乡。船到霞凝港时，正遇上有士兵检查，情况十分危急，在这节骨眼上，可巧碰到老乡李罗叔，他当时在国民党军队里当一名下级军官，我立即叫他，闲谈几句之后，他提出要向我借点钱，我答应了。他拿着我借给他的几块银元，满脸堆笑，挥手示意，我离船登岸，于是，又一次躲过了一场风险，把电瓶安全运到目的地。

临近解放，乡下形势也紧张起来。长沙和平解放的前几天，有三个国民党特务到了架设电台的附近山上，当即被周传第的武装发觉，就地处决了。记得茂伯曾这样对周传第他们说：“办得好，以后再发现有特务，都要立即解决。”

1949年8月4日，我方电台播发了程潜、陈明仁领衔宣布起义的通电，湖南宣告和平解放，秘密电台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电台的工作人员从此公开露面了。这时，我为他们在发报机房前拍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照片上报务员李勇同志的头发蓄得很

报晓的知更鸟

梁宜苏

长沙和平解放四十周年了。和平解放前夕，我们曾在这里建立“迎解秘密电台”和“策反情报小组”，进行隐蔽的斗争，有如黎明之前的知更鸟，给长沙和湖南人民报晓。那富有诗意的战斗，至今想来犹倍感亲切。

我们的领导人是周竹安同志。他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从事过多年地下斗争，在社会上很有名气，国民党对他很注意。竹安同志深知一切，他隐迹家乡，深居简出，使敌人无从怀疑。他秘密地指挥其堂弟周茂僧打着“中央军校毕业生调查处长沙分处”的旗号开展迎解地下活动。1949年4、5月间，周茂僧奉周竹安之命进城与参加电台和情报小组的工作人员联系。那时我正从汉口南方局领来电台机器，又转去衡阳向伪空军办理了退伍遣散手续，准备立即开展工作。二周急于找我，

长，那是因为几个月来他一直隐居在周商农家，未曾理发。湖南和平解放后的第二天，李勇和章朴即启程返上海，电台由李勇带走。电瓶由我和周浩磊暂时保存下来，直到1949年10月20日才送交长沙县沙坪区公所。

蔡正杰 整理

（本文作者，现年六十岁，任陕西省榆林地区行政公署驻西安办事处副主任。）

因记错暗号，派钱去非两次接头扑空，以致疑云顿起。但是，我是携带电台机器的人，不接上不行。周茂僧和刘晓芳同志又第三次接头。

他们来时正遇着我，但把化名“徐敬”说成了“陈敬”。我说：“梁宜苏刚出去，临走时说如果有个姓徐的来找，就请他等一下，没说姓陈的。”周恍然大悟，马上改口说：“我姓陈，名陈敬，是徐敬介绍来的。”我说：“徐敬呢？”周说：“他去广西跑单帮了，托我来取点东西。”对上了，我把电台交了出来。以后电台和小组的活动，一切都由茂僧在竹安和我们之间上传下达。竹安对我们的领导是遥控，可能是还有疑虑。这也难怪，情报组的张海鹏接头后，就回乡树起了反共旗号，拖枪杆子上山为匪了。一次，我联系的三青团负责人梁式儒来向我汇报，恰碰上小组开会，这使二周对我更不放心了。

五月初，北京派章朴同志来作报务员，原来他就是我在重庆认识的章纪懋同志。旧友重逢，分外亲切。从此，二周往日对我的疑虑消除了，凡是有关电台和小组的疑难问题，茂僧同志大都和我单独商量研究。

电台最初设在上营盘街钱去非家。工作不久，碰到了敌特的侦测，若不是我们行动迅速，险遭敌人毒手。电台转移到浏正街李维城家，又遇到清查户口的麻烦。幸而李是省银行行长，和警察局长李肖白熟识，经交涉，才为章朴解了围。经过这些波折，周茂僧带章朴到我家隐蔽，并研究决定把电台转移到乡下去。

根据竹安同志的布置，电台安排在东乡九福乡乡公所，以乡公所的武装保卫电台。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七月初，白崇禧、黄杰的部队开到长沙附近，白逼着程潜将军要按他开的黑名单捕人。于是城里的地下党人大都转移下乡，许多乡镇树起了游击

队的旗号。我们电台是由党中央直接领导的，没有和地方组织联系，有些同志对我们产生了误会，以为是来历不明的“敌特电台”。他们一面下通牒，一面准备武装包围，大有“大水冲倒龙王庙”之势。经过许多曲折，才找到曹伯闾同志为我们疏通渠道，避免了一场“三岔口”的演出。

长沙和平解放一举成功，四十年过去，我们都老了，面对祖国四化宏图，回想当年艰苦斗争岁月，真如老骥伏枥，不免感慨万千，奋然思起。

（本文原载《长沙晚报》，作者曾任湖南省博物馆馆长，现已离休。）

掩护地下电台

任培宇

湖南和平解放四十周年了，四十年前，我为掩护设在距桥驿车站西北十华里的洪家冲万家屋场地下电台做过一些工作。往事如昨，好些情景仍历历如在眼前。

话，还得从我自身说起，我是黄埔十七期毕业的，在国民党军队中服役十多年，曾任中校参谋、副团长等职。抗日胜利后，进了第七军官总队，以后上面派我去东北参加“剿共”打内战，我坚决不干，并办了退役手续。过些时日，再进广州警官学校甲级警官班，学习一年，回到长沙，等候分配工作。这时已是1948年春季了。闲暇无事，与一位有戚谊关系的李我九先生经常往来，过从甚密。李在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国军第十战区政治部少将副主任、信阳绥靖区新闻处长，光复后他辞去高官厚禄，打入湖南省保安司令部任人事室主任，从事中共地下活动。交往中他对我逐渐了解和信任。一日，高兴地把一份叫“湖南进步军人民主促进社”的组织章程给我看。看后，使我胸怀大开，心向往之，于是我郑重要求参加这一组织，李便成了我的介绍人，并得知“民促社”是中共在湖南的地下外围组织。通过李的关系，又把我公开安插在省保安司令部所属水上保安总队，任少校督察长。

1949年春末夏初之际，上级在确认我策动水上保安总队起义已具成效的情况下，又命我与另一“民促社”成员周石泉合作，

偷运武器下乡，组建一支由我方地下控制的武装力量掩护电台工作。首先，我和周石泉一道去长沙绥靖公署警卫团，找该团团长程元商量，请他给予支援，并谈好由他设法把枪弹运到中山路河边。

第二天，他如约派了一辆汽车，并由该团迫击炮排士兵押运，送到预约地点。我们立即指挥早已组织好的人员，把包装的武器装进事先隐蔽在河边木船里，装完即起锚。船到霞凝港靠岸，然后人挑肩扛，运到九福乡的洪家冲万家屋场周商农家，计步枪170枝，轻机枪8挺，子弹好几万发。加上当地各乡公所原有的枪枝，共是数百人枪，对外挂牌是长沙县北境“六乡联防办事处自卫大队”，包括铜官、九福、霞凝、太平、青山、青云乡。记得当时在这个办事处的成员有霞凝乡乡长左元春、九福乡乡长周传第、铜官乡乡长张楚鑫，以及周茂僧、周石泉、任培宇和曾任国民党将领李默庵秘书的简厉初等人，而周传第又是时常配合电台专业人员一起工作的。

我掌握驻周家这个中队，担负的风险更大，因为白崇禧败退来湖南后，白色恐怖严重升级，地下电台设在长沙市已很不安全，便秘密转移到这里。当时，驻地附近驻有白崇禧的部队，形势是严峻的，既要提防便衣特务暗地侦察，又要防范白部武装的突然袭击，真是时时高度戒备，日夜严阵以待，白天对往来的附近的可疑行人，晚间一声狗叫，都不敢掉以轻心。

每到夜晚，电台工作人员便全神贯注地伏案工作，清晰而断断续续的嘀嘀哒哒之声，划破深夜的沉寂，呼唤着东方的红日，催促着新中国诞生。这声音，使人平添无穷热力，鼓舞起昂扬的斗志。时至今日，我仍然忘不了那几位工作人员的模样，因较长时间的室内活动和夜间工作，几乎足不出户，面庞显得有些苍白和疲倦，衣着随和朴素，但又觉得到，从他们的

眼神中常流露出一种兴奋的神情。

掩护电台的工作是内紧外松，表面看来似乎并没有这件事。记得有个来自第四野战军十二兵团，名叫欧阳海的四川人，开会时常常吵着要把我掌握的这支部队拉去前线打仗，迎接南下大军。当时我们都是单线联系，在没有得到上级指示前，我是不会轻易听从其他人的安排或调遣的。当时又不好对他明言我的任务是保护电台安全，只好用其它理由搪塞过去。这也说明，可能他并不知道这里设有地下电台一事。不久，组织上便安排他去长沙市区活动了，还听说为了安全起见，他常在湘江河里的木排上过夜。

“六乡联防办事处”掌握的这支部队，成员来自各个阶层，情况比较复杂，为了提高官兵素质，稳定情绪，我们注意了加强思想教育，曾多次教他们唱《山那边呀好地方》这支歌：“一片稻田黄又黄，男耕女织喜洋洋……”从此，操前饭后，营房里常传出阵阵歌声。为严明纪律，一个叫吴立人的队长曾因损害了群众利益而违纪，我和周石泉果断地将他免职，并以此向部队进行教育。

随着时间的推移，长沙解放已是指日可待了，为配合我方的政治攻势，我们在加强对电台警戒的同时，还做了一些宣传鼓动工作，如在深夜派员至市郊和乡村小镇，张贴以朱总司令和毛主席名义发布的《约法八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文告，一时在群众中震动很大，当地国民党军政机关更是惊恐万状。

记得驻杨桥火车站白崇禧部的一个连，曾捉去我们派往那一带搞夜间活动的两个人，事发后，我们一方面采取紧急应变措施，避免再次失误；另一方面就是设法把人员救出。更担心白部一旦对他们实施刑讯逼供，要是说出实情，那后果就严重了。大家一时束手无策，周传第便对我说：“大任，还是你去

一趟吧，设法把人弄回来才好。”当时我也确实有些为难，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里去相机行事。见到那位连长握手打招呼时，发现他左胸上挂着个军校毕业纪念章。当我作了自我介绍后，便和他拉黄埔同学的关系，彼此谈得很融洽，他还特地做了几道菜留我吃午饭，席间，我便礼貌地提出要那两个人，他即满口答应交我带回去。不用说，这个意想不到的好结果，给我们联防办事处几位同仁带来很大的愉快。当时，由于我的公开身份是省保安司令部水上保安总队少校督察长，在国民党政权时期，是很讲究身份和地位的，这也为我办好上述那件事，以及从事其他活动以有利条件。我这时虽在乡下，每个月还是回总队部一、二次，停留的时间也很短。

这年7月20日，我由联防办驻地九福乡返回长沙市区，准备到对河银盘岭水上保安总队驻地处理公务，其时，李我九当面交给我一份由程潜签发的命令，着水保总队于本月20日下午五时前进驻湘潭汽车西站，控制渡口云云。于是，我便又全力投入到掩护程潜省主席及省府机关要员平安渡过湘江，西去邵阳，以及后来护送程潜返回长沙的特别重要任务。

（本文作者，离休干部，现年69岁，平江县第九届政协委员，岳阳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居平江县长寿镇东北街。）

写在后面

1949~1989，整整四十年了！为纪念湖南和平解放四十周年，本辑特就我党中央当年设在今望城境内的秘密电台这桩重大史实，从多方面搜集资料，进行整理，现发表如后。其中所述情节再现了当年的斗争风云，读来感人至深。

然而，要说明的是，几位撰稿者都不是直接掌握秘密电台的负责人，在当时那种特殊情况下，多系单线纵向联系，各负其责，一般不存在横向交流，因此，就很难准确而全面地写出事实的全过程。特别是文中关于秘密电台最初设在长沙市区的地点就有出入，一是由上营盘街至浏正街，一是北门外的潘家坪，究竟谁是谁非呢？经我们多方查访，最后才弄清这一史实真象，关于秘密电台工作的地点，最初是从银盘街到浏正街，因情况不断变化，又搬到潘家坪工作了一段很短的时间，然后，才移到桥头驿附近的洪家冲周商农家里隐蔽下来。但关于几次搬迁的具体时日却无从弄清，我们热望知情者协助查找、订正，谨致谢意。
